怀念北图馆长北大教授王重民先生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徐自强

得悉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合办“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敦煌写本文献研究、遗书修复、数字化技术国际研讨会”事，心情十分激动，一些与此有关的往事，顿时涌上心头，历历在目。

回想过去，最先知道“北京图书馆”与“王重民教授”的名称和名字，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于一所中学图书馆兼任图书管理员和建国初期供职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教育科的时候；目睹王先生尊容，聆听有关讲话，则是在 1956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以后；1965年北大毕业分配到北图善本特藏部工作，增多了闻见的机会；当编完了《图书府库》（即《北图简史》）书稿，参阅了较多资料后，始对王重民馆长有了较深的了解，萌生出钦佩之情。现在，得知要纪念他诞生一百年，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不觉要赘数语，以示心中崇敬之意。

〈一〉

王重民字有三，河北高阳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3）生于该县西良淀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姊妹四人，排行第三。十二岁（1914）入高阳小学求学，十八岁（1920）考入保定六中。其于课余时喜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同学成立学习马列主义小组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二十二岁（1924）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得袁同礼师的介绍，曾利用课余时间到国图前身“北海图书馆”工作。从此，他与图书馆与目录学结下了不角之缘。其后，又曾到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更加深了这方面的认识。

北师大毕业后，王先生于 1928 年春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供职。其间：1930 年被北图任命为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1934 年被北图派往法国国立巴黎图书馆工作；1938 年再次被派赴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办事；1939 年欧战事起，转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继续为北图收集海外资料；1941 年抗战紧张期间，为保护北图善本书事，曾从美国潜回上海活动二个月；1947 年二月回到北平图书馆供职，任参考部主任；1948 年 12 月，北图馆长袁同礼到南京“述职”离开北平赴南京（后去美国并在美国辞世），馆务交由王重民先生负责。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国立北平图书馆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王重民先生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代馆长），直到 1952 年 8 月，专职于北大图书

馆专科以后，才从行政关系上离开了北图。

王先生在北图工作，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大变革时期，膺受重命，渡过难关，保护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功勋卓著，精神可敬。正如他在1948年12月21日和1949年1月28日致全馆员工的两封公开信中所言：“袁馆长在昨天清早飞往南京去了，想诸位同人都已听说，并且都很惆怅。袁馆长行前，托我转给大家一封信，我把他抄在上面。我是一个‘书生’，没有经验，没有能力，那敢担任这个职务，但念现在正是‘同舟共济’的时候，我跑来参加，和大家一同拨桨，一同维护我们所寄托、所凭藉的‘舟’——北平图书馆，共患难，共甘苦，也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当前的任务，一是保护我们的馆产和图书，一是共谋同仁的安全和福利，”（2）这是一个在三十多年前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声音，一个爱国学者的声音，今天读起来还为之感泣！

王先生掌管北京图书馆后，不仅要谋划北图的事，同时还要筹办北京大学图书馆专科的事，还要开课，进行学术研究，其工作任务之繁重，时间之忙碌、紧张状况是可以想见的。下仅以在北图的情况为例，就可见一斑。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一方面要参加馆外的重要社会活动（如1951年7—9月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的“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的工作，任副团长兼第二分队队长，在江西瑞金等地参观访问；1951年8月以后担任“印度史迹委员会通讯员”等），主持馆内重大事务（如解放初期北平图书馆接收了“松坡图书馆”后，经筹备后于1949年9月1北海公园举行“北平图书馆快雪堂分馆”开幕典礼，王先生主持会议并讲话；建国初期北京图书馆接收“赵城金藏”后，于1950年5月举行“赵城金藏展览工作坐谈会”，王先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等等）；同时，还要过问、草拟、签发各种文件、报告，制定规章制度，检查督促工作的开展等等。仅以签发审定文件一事而言，事情就够多的。根据已公开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统计，王先生在建国前后任职满全年的1949—1951年合计就达52件，其中1949年14件，1950年21件，如1951年17件，最多时，一天中就要签发2件，如1950年3月20日，1951年3月9日、3月12日、9月22日、11月1日等，均日发2件。于此可知，先生工作之实干苦干精神，是十分可钦佩的。

先生在北图的工作如此，对当时兼任的北大任务，也不例外。如：

1947年初，回国不久，就向胡适建议：北大应办图书馆专科。获准后，亲自主持，先开办培训班，限招北大中文、历史两系中成绩在75分以上的学生，至1950年开办了两期。同年，又在北大中文系任教，讲授《敦煌俗文学》。

1949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图书馆专科，亲兼主任，一切活动、事务均由他主持，并开始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

1950 年，王先生为图专筹划开设《中国书籍制度史》、《中国图书目录学史》、《版本校勘学》，亲自主讲《中国工具书使用法》。

1951 年，先生又筹划北大图专改图书馆学系的工作；开始为已开之《中国目录学概论》编写讲义。

1952 年，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北大校址由城内沙滩迁至西郊海淀，因来住不便，王先生辞去北图副馆长职务，专职在北大工作。同年，与友人合作，着手将《中国工具书使用法》讲义改编为《参考书与参考工作讲义》。同时，又亲为图专高年级学生开设《目录学与书刊评介》课程。

1953 年，续任图专主任，续开《目录学》与《参考资料与参考工作》课程。

1954 年，筹编北大图专由四年制改五年制的教学草案和为文化部社管局、北图、北大图专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使用的《普通目录学》教学大纲，作为教材。

1955 年，为北大图专改系作准备，编《普通目录学》讲义，《社会政治书籍目录学》教学大纲和讲稿，制定《历史书籍目录学》大纲。

1956 年，北大图书馆专科改为图书馆系，先生任系主任，直至昱年 8 月。又亲授《历史书籍目录学》，编写《社会政治书籍目录学》讲义。

1957 年，编写《中国目录学史》讲义纲要。

由上述可见，王重民先生在建国前后近 10 年左右的艰难岁月里，迎着急风暴雨式的变革，为国家图书馆的建设，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创立，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成就和精神不仅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而且是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后辈。笔者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从考古改行到图书馆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其后又主要做行政管理工作，又从搞学术变化为行政；尤其是从七十年代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北图新馆建设，成为一个搞工程建设的的人……面对这些不如已意的现实，在思想十分矛盾的情况下，还能安下心来尽力地去完成所担当的任务，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果，除了组织上服从以外，包括王先生在内的前任馆长和先辈学者们的影响和榜样的力量，对我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王重民先生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周一良师说：“王有三（重民）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在有关目录版本之学的研究、教学、

编辑、整理上，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的贡献。”（3）北大图书馆系白化文教授则认为：“王先生的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和敦煌学、史学和索引编纂等方面，王先生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说他是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和敦煌学的代表人物，绝不过誉；说他是中国现代学术论文索引编纂的奠基人，也是公认的事实。”（4）笔者作为晚辈后学，对王先生的学术成就，无力再作其评述，只能说在学习前辈和先师的著述、了解先生的言行过程中也有同感而已。笔者在此想要说的，则是拟从另一个角度再谈一点感受。

我们做图书馆工作的人，经常讲到的一个“口头语”，就是要做好“基础工作”。这句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谓“万丈高楼从地起”说明地基不牢，高楼是要垮台的，即或是建立起来了，也只能是沙滩危楼，经不起风吹雨打的。那么图书馆的基础工作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各种载体的图书资料的采购征集，各类书刊（包括电子读物）的整理编目，各类资料目录索引的编制，以及方便快捷完善的服务体系等等。这些工作做好了，既便于广大读者使用，也利于自身工作的发展。这种“基础工作”，图书馆需要，任何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学者也需要。王先生既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又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当然深知其中的奥妙。故在他的一生中，这方面的成果也就十分突出。可以说：访书与校书、撰叙录、写提要题跋、编索引与志书、纂注论集等花去了他大半的时间，半生的精力。

王先生做基础工作，是从编“索引”开始的。那还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当时，他还在北师大上学，深得陈垣、杨树达、高步瀛、黎锦熙、钱玄同等大师的赏识，学识也进步很快。在他二十三岁（1925）时的一天，黎锦熙先生告诉他说：年来出版杂志甚多，可编索引以纲领之。从此后，有三先生以冲天的干劲，不倦的精力，利用暑假前后的四个月时间，遍访北京各图书馆，翻阅杂志 59 种，编成《国学论文索引》一部，成书五巨册。后于 1928 年，又利用在北图工作之便进行增补，共得杂志 82 种，集论文 3000 多篇，印刷出版，成为当时国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书。（5）同时，也开启了国人晓知“索引”之利于科研，因而接踵地开始了各种专门索引的编制。以此为契机，1930 年北图任命王先生为“索引组”组长。其后一生中更编制了多种大型索引，如《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5 年出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编辑出版）等等。

王先生的第二项基础工作，是在从事目录学研究的同时，开始了对有关古籍的考察、校勘和撰写提要、叙录的工作。首先开始的是 1925 年进行的《老子考》。他仿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之例，又补其所不涉及之版本项目，提要钩录有关《老子》的著作近 500 种。其次是对杨守敬观堂遗书的整理，辑成《日本访书志补》46 篇（1930 年出版），《史略

校勘杂记》（1931 年发表）。其后陆续成书者，有：

1927 年，编成《四库抽毁书提要稿》（1930 年出版）。

1929 年，《续修小学考》100 卷，《谢氏小学考校勘记》5 卷，《附辑小学考简目》10 卷，《清人字说选录》5 卷。这些著述，虽未能正式出版，以利学人，但对王先生学识的增进，却大有裨益。同年又辑校《列子》一种，编入《西苑丛书》（1930 年出版）。

1930 年，编李慈铭著《越缦堂文集》12 卷；校辑李著散文 134 篇（北平图书馆 1930 年出版）；又校辑《越缦堂读史札记》，收札记 11 种，王先生多写有跋语（北平图书馆 1929—1930 年出版）。

1932 年，校辑《孙渊如外集》5 卷，收录孙之未刊稿篇 91 篇，附骈文 10 篇（北图 1932 年出版）。

1933 年，继章学诚编志之遗绪，撰成《永吉县志》和《无吉县志》。

王先生最重要的提要叙录之一，要算在法、英、美三国图书馆工作期间的著述。他在北平图书馆的派遣下，经过自己的努力，有了丰硕的收获。

1934—1936 年，写成《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并在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陆续发表 41 篇。与此同时和其后一段时间，又在欧美各国图书馆和有关人士中收访古书材料，撰成善本提要 6000 多篇。198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善本书提要》时，收录了其中 4400 多篇。又辑《太平天国官书》4 册，1936 年出版。

1938 年，撰成《伦敦所见敦煌卷子群书叙录》一文，1947 年发表。

1939 年及以后一段时间，在美国又撰成提要 1600 多篇，编成《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善本书录》，1975 年影印出版。其原稿中有些被删去的内容（如板框尺寸，前人题记，重要序跋等）在编《中国善本书提要》时，得以补刻出版。

1946 年，撰成《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文库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收提要 1000 种，1957 年出版。

195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先生校辑之《敦煌曲子词词集》。

1955 年出版《善本医籍经眼录》，著录善本医书数十种。

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先生等合辑之《敦煌变文集》，收变文 78 种，成书 8 卷。

1958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敦煌古籍叙录》，此为王先生在法、英访敦煌卷子时所写之题记，记录和考订的有关内容，主为四部古书的品种。

1962 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先生编辑之《徐光启集》12 卷，又附录二篇。

1965 年，出版《〈永乐大典〉纂修人考》收考纂修者 246 人，费力颇巨。

1985 年，后学整理出版《章学诚〈校雠通议〉通解》四卷，前三卷为注解，后一卷为附录。附录内容：一为《章学诚目录论文选》，二为《章学诚大事言表》。

从上述可见，王先生所做的“基础工作”，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成效显著，有益于学界者，是难以用三言两语所能述及的。

尤其可贵的是：王先生在进行这些工作时，不只是一个“抄书匠”、一个资料员，他还是一个学者。他是在自己科学研究的指导下进行的，是在学术研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展开的。故其成果的学术价值就更高。

那么王先生坚持的学术上的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一是重视材料，重视考据，但又不繁琐考据；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在实践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客观地、辩证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得出结论。其中第一点，王先生重视材料、考据的情况，从其所做的大量“基础工作”中可以得到证明；关于第二点，我想从下面两个实例中可以得到启示。

第一，王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撰了《顾千里校勘学》（6）一文。先生在该文中所言，笔者认为：既是对顾千里的评述，也是王先生个人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的流露。下抄录几段，以见一斑。

“千里的学问是很广博的，版本目录是他的当家学问。但这一学问，必须有广博深厚的基础，方能做到好处。……在实践经验（墨点为笔者所加，下同）中，千里的版本目录之学，步步提高。而在这三十多年中间，竟由他转移了旧的风气，造成新的风气。顾千里对于版本学所以能够有正确的认识，是由于他在四十年的校书、刻书实践中，既有丰富的经验，又能辩证地分析问题，而客观地提到理论上面去。”实际上，这些评述都成为王先生一生活动的影子，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最后达到的境地。如果我们将“顾千里”换成“王重民”，同样用这一段话来评述，不是也很贴切吗！？（同样，下引各文也可如是观。）

“对于古本书的价值，……佞宋者说宋本都好，固然不对，反对佞宋者说‘宋本不足重’也不对。只有能够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从实践中得到正确的认识。……难能从实践中发现了不同的问题，或者相反的问题，再把它概括起来，找出一般的原则，才能提高这门科学的水平。”

“顾千里的校书方法，是包含着极其客观的观点和很深奥的理论的。很可以称为是他的校勘哲学。我们承认顾千里是最善于校书的人；但他提出的校书方法是不校校之不方法。这一方法和精神，贯穿在他的整个校勘之中，并且给他的校勘工作造成了辉煌的成就。”

“顾千里的校勘学在校和思（就是逮寻致误之源并且判断是非），至少这两方面是并重

的。论断校勘文字的是非，必须与他书相证互通。”

“顾千里的校勘学所以成功，还由于他始终坚持着客观的方法，与求实态度。”

“李兆洛首先阐述了清代校勘学的特点，特别推重乾嘉时代，而对于乾嘉时代，他以顾千里为‘魁杰’，这并非过誉。……李兆洛这样判断是有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

“顾千里的精神，顾千里的伟大处，是‘是非所在，持之甚力，无所瞻徇’（7）。”

“顾千里生于清代所谓藏书鼎盛时代。私家藏书的特征是私有，是秘藏；……在这样的沉重空气中，独独提出秘本的通假，这更表现出了他的进步思想。……直到现在一百五十多年来，都在受着他的思想影响，这更是他在我国版本校勘上不可磨灭的贡献。”

“顾千里对于翻刻古书的意义，发表在《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序》（8）里面。……他认为‘物无不敝，时无不迁，后乎今年’宋元本当‘同三代竹简，六朝油素’一样稀少。所以他提出了翻刻宋元本的办法，……。办法的总精神，在‘覆而墨之，勿失其真’。这是顾千里以前的校书家所没有提出的这样坚持真理的办法。”（9）

笔者此地引用了王先生许多话，只是想表明：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已立下了献身图书馆事业的宏愿，故用心写了这篇评论。实际上正是先生城肯定顾千里生世言行、功绩成就的过程中，来确立自己成业之道及开展研究与工作的观点与方法。那就是在行文中多次强调的实践、求实、客观、辩正、真理等等。为探索先生坚持真理的态度，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的例子。

刘修业先生在王重民“活动编年”（10）中说：“1974 年……6 月，江青在天津‘儒法斗争报告会’上，宣布‘又发现了一部李卓吾（鸷）的《史纲评要》，现正准备出版’。这是‘四人帮’出于搞政治影射的需要而提出的。不少专家怀疑这部书是托名李卓吾的伪书。为镇住众人，‘四人帮’在北大、清华的代理人想让有三从目录学上予以正面的鉴定，借助于他在目录学上的威信肯定这部书。但有三从学术上研究后，认为是伪书，不肯说出卖良心的话，因此遭到忌恨。有一次他们发着火指着有三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完会撕去科学的伪装，赤裸裸地加以利诱和威协。这伏下了后来他被诬蔑迫害致死之祸机。”1975 年 4 月，王重民先生在‘四人帮’的进一步迫害下在颐和园含冤而逝，了却一生。笔者认为：王先生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不出卖良心而殉“志”之精神，是无可非议的，是坚持真理的一个典型事例。

王重民先生在图书馆辛劳一生，为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基础工作，为我们今天以至后人都作出了表率，其影响是深远的，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史和学术史上都应是不可磨灭的。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三十多年，所做的一点工作，无论是征集资料，公布读者目

录，编制书目索引和资料汇编，还是筹建新馆，组建分馆等等，都总是离不开前任馆长和学者先师的身影言行，是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进行的，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就是在继续完成他们的遗愿。正如刘修业先生在《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中所言：“有三认为北京图书馆是国内藏书最丰富的综合性图书馆，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故他提出收购当时流散全国的善本书，并扩大馆址，增加阅览室，以容纳更多的藏书，供给更多学者研究的建议。但未获采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于一九八四年在紫竹院北侧，为北京图书馆建立新馆址，占地 7.12 公顷，可以想见有三以前的计划还是有远见的。”

〈三〉

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工作成就是突出的，收获是巨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周一良师评他是“研究敦煌古籍很有成绩的学者。”并论述说：“有三先生的研究，正如本书书名所表示，主要是在敦煌写本遗书方面。他关于敦煌古籍的题记和本书中所收的这些论文，直到今天，我们还需要参考。……他的工作是高水平的；在今后若干年里，他的研究成果将始终是可信赖的。”（11）白化文教授的评述，则是称王先生为“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和敦煌学的代表人物，绝非过誉。”并具体论述道：“以敦煌学说，我国第一代敦煌学者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等先生以后，远赴欧洲进行大量研究工作的学者中，公认成就最高，后来成为学术带头人的，是向觉明（达）先生和王先生。王先生在敦煌目录学方面的贡献，厥功尤伟。”又说：“以敦煌学而言，1934 年夏，王先生奉派去法国与英国工作，直至 1939 年欧战开始后撤离。这五年多时间，大量地接触了伯希和与斯坦因盗去的遗书材料，所得甚丰，从材料搜集等方面奠定了以后研究的基础。这段时期，不但对王先生个人，即便对于国际和我国敦煌学界来说，都可说是一个高潮时期，黄金时代。据笔者粗略统计，在这五年多时间里，连节假日统计在内，不算看其它大量汉文材料，如太平天国资料等（起码占去一半工作时间），王先生每天得看五六个敦煌卷子，并作详细记录。而其所得材料，在王先生逝世十六年后的今天，尚有未经整理发表者。其工作量之大，收获之丰，实在令人惊叹。”（12）

上述两位师友的评价，笔者虽系晚辈后学，但通过个人工作实践（如二十年来参与筹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并在其中工作，组建北京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整理王先生所摄敦煌照片，编撰有关敦煌学的论文与著作等）的体会也有同感，现在，要补充的是另一些感受。

第一，王先生一生中总能将担负的行政工作与学术科研工作很好地结合，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相得益彰；在学术工作中，又能将基础工作与研究工作巧妙配合，均能成果累累。以

敦煌学为例。王先生在英、法等国的活动，既出色地完成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任务，又为国际敦煌学，我国“国学”等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如《敦煌古籍叙录》1958 年出版;《太平天国官书》1936 年出版;《中国善本书籍提要》1983 年出版），同时又撰写了大量具有高水平的论文(如《敦煌遗书论文集》1984 年出版)等。这种科学合理的利用时间，巧妙的工作安排的能力，冲天顽强的干劲，刻苦认真的态度等，不仅是难能可贵，而且是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第二，敦煌藏经洞所出文书中，佛经占绝大多数，估计约占 80％ 以上。其内容在二万卷虽多有重复,有的一种经名达千种以上复本，但不同品种也仍在 400 种上下。在如此浩繁的经卷中，王先生均能尽力采录，以不废英法之行；同时，还能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正在编梓之际，于 1962 年挤时间撰写了《记敦煌写本的佛经》一篇，虽非专著，也是达 15000 字的长文。该文对敦煌遗书中的佛教典籍作了全面的概括与论述。文中虽以汉文佛经为主，也兼及藏文、回纥文和粟特文。对汉文佛经的叙述：道先讲佛经在中国国内翻译的情况，敦煌石窟寺写经、藏经的历史，封藏的原因；次及敦煌藏经洞写经发现后，被外国探险家掠夺的情况以及世界各国藏经的现状；第三分析佛经内容及其特点(如复本的差异、书写的特征、尺寸的长短、题记的早晚等)，以及北魏、隋唐、吐蕃与张氏、曹氏等时期写经的简史；第四讲写本佛经的价值及考证、研究、利用的情况；第五介绍有关三阶教、禅宗、藏传佛教的有关经典及相关问题的考述。由此可见,该文是对敦煌佛教写经高度概括与初次总结的宏文,是一篇整理研究敦煌佛经写本的纲领性文献。这也反映了作者的功底与水平。尤其作者还在文中号召并希望我们继续工作,以充分发挥文献的作用。王先生说:“敦煌佛经中的古写本与古佚本,对于校补宋元藏经来说,还有很大的功用,而这一功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13）

笔者与有关同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编辑出版了《敦煌大藏经》一部，虽已出版了正编（计 63 册），收集了经卷约万卷，并将每卷内容与当时正在出版的汉文版《中华大藏经》（正编）的相关经典做了校勘，注出了相对应的页码，利于学人使用研究，但还有《续编》（计 17 卷）未能出版，（且拟将敦煌出土的古佚本古写本佛经全部收录在此篇），故而编大藏经之初衷未能完全实现。王先生所指出的“古写本古佚本……这一功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任务，亦未能完成，深感遗憾。看来，这只有待来日的工作了。但是，无论如何，王先生的号召是强有力的，我们作为晚辈后学，应力争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作为，这才是对前辈先师的最好的怀念。

2003 年 4 月于京华寓庐

注　释：

（1）刘修业编《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载《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后文中凡再引用此文材料者，不再一一出注。

（2）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下册921—922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后文中凡再引用此书材料者，不再一一出注。

（3）王重民著《敦煌遗书论文集·序》，中华书局1994年4月出版。

（4）王重民著《冷庐文薮·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5）见注（1）。

（6）此文无具体撰写年代，1980年3月《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0年第一期发表此文时，只注“此稿由郭建文同志整理。”一语。查刘修业编《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中1931年节有“在清代学者中，他最推崇章学诚之校勘学”语，1932年节有“他留意清代学者的辑佚工作，撰写《清代两个辑佚书家评传》，还拟编辑《辑佚书目》为辑佚书进行一次总结，……他又留意清代学者集外集的编辑，辑《孙渊如外集》五卷。”等等。据此环境分析，笔者推定其文可能作于此时期。

（7）此小段“引文”为李兆洛对顾千里的评语，王先生借此以表已意。

（8）此引书名，载顾广圻著《思适斋集》第十二卷中。

（9）本引文中之王先生语，均见《顾千里的校勘学》（在刘修业编《王重民教授著述目录》中称为《顾广圻的校勘学》名称有异）一文，载王重民著《冷庐文薮》一书103—114页。对顾千里笔者也是十分敬重的。鉴于他对金石资料的重视，北图金石组又有“顾氏石墨”的专藏。因此，在整理“专藏”和学习之时，也曾拟对顾千里写点评议，但因认识有限，又忙于行政工作，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只走了第一步，编著了《顾广圻石刻题跋选录》和《<顾氏石墨>概述》等文在《文献》与《文物》等刊物发表后，即停止了，有些遗憾。当时王先生此文未发表，无缘受教。1992年发表此文时，又时过境迁也无思再提笔，今写此文时，再读一遍，实觉先生在此文中早已说过了笔者想说之话，而且高出许多。欣欣然，不觉有憾焉！

（10）载王著《冷庐文薮》912—913。

（11）见注（3）

（12）上述两段引文，均见注（4）。

（13）王著《敦煌遗书论文集·下编》304页。